

■ 椒言辣评

# 拿奖学金就得请客?

新闻背景:大二快要过去的时候,在广西某高校就读的王斌获得了一家单位赞助的校级三等奖学金,还没来得及把奖金信封装进书包,王斌舍友便拉着要请客。要不要请客,王斌在手机上搜索“奖学金请客”,发现有类似经历的人还挺多。

(7月7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①读者童其君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一个人活着总不能只想着自己,只有你乐我乐大家乐,才能拥有真正的快乐。拿到奖学金确实是一大乐事,一桩喜事,但要懂得与人分享自己的喜悦,请舍友吃饭应该高高兴兴大大方方才是,一来可以培养自己和舍友的感情,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,也建立了彼此之间的友谊;另外,可以激励他人通过不懈的努力争取奖学金。依我看,拿奖学金请客吃饭这钱花得值!因为,分享快乐是一种境界,更是一种素质。

②黄冈市邓元泰镇中心小学刘传斌 大学生请客现象早已有之,但如果拿到奖学金就得请客吃饭,动辄几百元甚至数千元,显然是一种赤裸裸的人情绑架,这会让获奖者有苦难言,影响同学正常人际交往,甚至助长校园攀比、奢靡之风的蔓延。学校设立奖学金制度旨在通过奖励优秀学生,激励更多的人发奋学习,在校园营造努力拼搏、积极上进的学习氛围,而拿奖学金就要请客无疑背离了这一初衷。笔者以为,朋友不是靠物质金钱来维系的,希望学校在奖学金的使用上,出台明确的惩罚措施,让那些打歪主意的同学不好意思开口。

③长春理工大学杨红星 遥想当年上大学时,每逢发放奖学金,三五好友相约,到一小饭馆小酌,聊聊人生,聊聊未来,甚是惬意。但用当下评论者的眼光来看,那样的行为真可谓“人人得而诛之”的坏风气。对于那些被附加了功利化目的的请客之举,应当呵斥。但对于为了单纯地增进友谊、共话桑麻的朋友间聚会,只要不违法乱纪,还是别那么“声色俱厉”了吧?学校是社会的一面镜子,奖学金请客也就具有了影射时弊的现实寓意。在我们对奖学金请客扣之以“人情绑架”“歪风邪气”时,是否也应反思,作为批评者的我们,是否仍在“请客吃饭”?

④读者关育兵 拿了奖学金就要请客,这样的思维其实是“打土豪”思维的延续,不管你财富来源的合法性,只要是得了好处,理当“利益均沾”;再往前推,那就是“均贫富”的思维了。社会当然要缩小贫富差距,但缩小贫富差距的方法并不能变成“暴力胁迫”。另外,除了奖学金外,大学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评选,要想胜出,群众的投票很关键,此时用奖学金请客就带有交易的性质了。这样看似“明智”的态度,其实是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,将会影响社会风气。

## 做主你的奖学金,不要被绑架



余娅怎么看

奖学金自己花?还是请客吃饭?从来都是个难题,笔者以为,对大学生而言,还是一次事关价值取向的选择。

用来犒劳自己,没有错,那是对自己勤奋努力的自己点赞;用来感谢家人、师长,没有错,那是对他们平日里支持和关怀的感恩;用来宴请朋友,没有错,那是和他们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……怎么庆祝,和谁庆祝,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考虑角度,不同的选择之间,并没有优劣对错之分,但选择的初心和动机,有高低之分。

如果促使你做出选择的动机是真心,拿到奖学金后,你下意识地想要让这份“幸福的果实”发挥它甜蜜的“功效”,激励自己、感恩亲人和朋友,这样的“正能量”,于己于人,自然是多多益善。

值得警惕的是,被“奖学金怎么花”困扰的大学生,大多已经被功利绑架,被旁人的评价裹挟,他们把许多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。用奖学金请客吃饭,因为怕不请客引来闲言碎语,因为想用一顿饭、一点甜头来讨好身边的人,建立起所谓的人情关系,换来人际交往的蝇头小利。有了这样的企图心,虽然心有不愿,但他们还是请了客;虽然请了客,却要背负“负能量”的“初心”反复折磨。

我们常说,大学是一个浓缩版“小社会”,它有纯真美好的一面,也有乌烟瘴气的一面。说它美好,因为身处其中的大学生,还保有天真烂漫的“孩子气”;说它乌烟瘴气,因为这里是大学生从学生变成“社会人”的过渡区、练兵场,不同的价值观在此碰撞、交锋、斗争,最终胜出的,就成为我们迈入社会时,主动选择带上的品质。

选择什么样的品质,并不是一件易事,从大学生们关于“奖学金怎么花”的纠结便能窥见。但选择再难,我们都不该回避,是随波逐流变成那个“自己都讨厌的人”,还是坚持不被“自己不认同的价值观”绑架,这正是我们的大学生最应该认真自学的一门课。

主持人:杨雨晴

## 对“成绩差被劝退”要反思如何“治本”

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 曹灿辉

近日,山东乐陵市江山国际学校对初二年级的近60名学生统一做出劝退决定,这些学生大多没有什么明显过错,只是因为成绩不太好。

正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初二学生,因为学习成绩不好,学校就擅自把他们劝退,在普法教育程度较高的今天,竟然还发生这样的事情,实在是荒唐至极。

初二学生“成绩差被劝退”涉嫌违法。我国现行《义务教育法》明确规定:“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,保证教育教学质量。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为适龄儿童、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。”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也规定:“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的受教育权,应当关心、爱护学生;对品行有缺点、学习有困难的学生,应当耐心教育、帮助,不得歧视。”

“成绩差被劝退”不是“有教无类”。教育面前人人平等,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,对不同类别的学生,学校本有教育帮扶的责任。“成绩差被劝退”如此粗鲁野蛮,无端葬送学生的前途,实在是违背教育的本质。

与“成绩差被劝退”相类似的“劝退式”教育也时有发生。比如,广西永福县一所乡镇中心小学根据学生考试成绩划分班级,将成绩最差的学生“分配到最差的教室,配备代课老师”,有家长将其称为“学渣班”。杭州余杭一所小学,教师根据学生成绩人为地分成精英组、平民组、麻将组等。

荒唐的“成绩差被劝退”一再发生,其背后除了学校领导老师法律意识淡薄外,更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“功利教育”思想在作怪,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育人观,必须予以纠正。

对“成绩差被劝退”问题,“治标”之策是:一要对其行为及时制止,让那些被劝退的学生一个都不能少地返回学校学习。二要对此给予孩子造成的伤害,采取相应的抚慰措施,比如,赔礼道歉心理安慰等,对孩子人格补偿与尊重。三要做出违法决策者,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在调查核实之后,启动相应的问责机制,让责任人对此承担行政和法律问题。

对“成绩差被劝退”问题,更要反思如何“治本”。要从招生体制改革着手,解决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两张皮的问题;要建立合理的教育监督机制,改革教育评价手段,淡化成绩观念;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,实现教育均衡发展。

## 办教育慎提“今年是某某工作年”

□ 李福忠

教育行政部门为了加大某一项工作的力度,在工作计划中,常常提出师德师风建设年、教学质量提升年、常规管理规范年、养成教育推进年、安全工作落实年等,“今年是某某工作年”屡见不鲜。

于是,在当年中,某项工作就被突出出来。先是上面开动员会,下发工作方案,然后基层学校就得依据方案做大量的工作,诸如宣传发动、成立组织、制定方案、开展活动、阶段性总结……实施过程中还得随时接受检查督导,年末还得接受专项考核,也少不了开个表彰总结大会,为活动划上句号,会上还会表扬若干个先进单位,确定几个先进单位典型发言。

此项工作如此轰轰烈烈地搞一年,当然会有一些效果,但它的副作用也不可小觑。

确立当年为“某某工作年”,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:今年这项工作是重点,别的工作可松松手了;这项工作今年是重点,明年这项工作可以不抓了。肯定不是。既然如此,那上面为什么要这样提呢?工作思路如此,在做表面的文字游戏,对基层学校工作也是一种折腾。学校各方面工作需均衡发展,而人力、精力是有限的,如果在某一方面过分用力,一定会导致整体工作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。

教育好比农业,培养孩子同培育树苗一样。树苗要生长,光照、温度、水分、养分、土壤、空气缺一不可。如果哪位农民在培养树苗时,将某年确定为“养分供给年”“温度保持年”“水分灌溉年”之类提法,并按着这种思路去做,在某一方面用力过猛,而看轻其他方面,不但树苗长不好,还会被世人沦为笑柄。

教育发展需要的是一种合力。孩子的成长需要学校各方面工作协调运转,不能刻意强调某一方面重要,而忽略了其他方面。单纯地强调某一方面的教育,是违背常识的教育,是畸形的教育。

如果觉得某一方面弱,的确可以加强一下,但强调当年为“某某工作年”是矫枉过正了。总是搞“运动”,教育就会一直偏离正常轨道。

## 当心! 通知书“有毒”

有安全专家近日监测发现,一款外观像word文档、名为“录取通知书”的病毒正在网络传播蔓延。该病毒伪装成名为“录取通知书”的word文件,一旦用户安装就会被植入恶意代码。该病毒不仅能监控用户操作手机的一举一动,还会窃取手机中的个人短信等隐私信息。不法分子进而可通过相关信息获取支付等类型验证码实施诈骗。

专家提醒,眼下正是高校发送录取通知书的时节,考生除了要提防填报志愿的钓鱼网站外,也应注意提防伪造的录取通知书等病毒链接。

薛红伟/绘



## 热衷儿童文学创作的教师为何越来越少

□ 罗义安

张之路、曹文轩、葛冰、杨红樱……很多知名儿童文学作家都曾经有过当中小学教师的经历,“中小学教师+儿童文学作家”甚至成了标配。但近年来,少儿文学杂志已难见教师来稿,出版社也鲜有教师作者。造成教师创作热情降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:课业、升学压力大,微信、微博等娱乐形式的冲击,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、被人视为“不务正业”等。

(7月7日《北京日报》)

天然拥有儿童文学创作优势的教师集体处于“失语状态”,遗憾里折射出些许无奈。个中原因,或许没有“课业和升学压力大”那么简单。笔者认为,教师搁笔的关键原因是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没有获得感。

过去,从事儿童文学创作,可以改变业余作者的职业走向,为业余作者提供更多的上升空间和更大的创作舞台,比如老

师在刊物上发表作品,既令人羡慕和敬佩,也可以调动工作,甚至从事专业创作。这其中的获得感和成就感,激发着广大教师的创作热情,吸引着更多的教师加入儿童文学创作的队伍。如此看来,有着教师经历的张之路、曹文轩、葛冰、杨红樱成为很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,也就不足为奇。

今非昔比,风光不再,且不说在刊物上发表作品,就是出版了个人专集,恐怕也享受不到过去儿童文学创作者的那种待遇。

笔者的一位同事,爱好写作,主要写小说和散文,题材广泛,已经小有成就,出版了两本书,成为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即便如此,也没有多少人“羡慕嫉妒恨”。在周围人看来,她是一名教师,在教育教学方面取得突出成绩,才是真本事。如果不能站好讲台、讲好课,发表再多的文学作品,

也不是一名称职的老师。

一路走来,作家头衔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实惠,反而带来负面影响。由于参加作协的活动,教学工作受到影响,她曾被同事旁敲侧击地提醒过,也曾被学校管理者含沙射影地批评过。一旦教育教学质量落后于其他教师,即便与文学创作无关,文学创作也成为“不务正业”的说辞。思量过后,她清醒地认识到:教育教学的突出成绩,可以成为她文学创作的动力;而文学创作的业绩,却不能弥补她教育教学的不足。

作为一名教师,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可以得不到实惠,但不能不被尊重,因为在尊重的基础上才有理解和支持,才可能有持续创作的热情。在儿童文学创作中,曾经的主力军为何处于“失语状态”?或许从笔者同事的经历中可以找到答案。